

唐代官员常服的文化美学审视

李 怡¹ 马 琳²

(1.北京科技大学艺术教育中心 北京 100083 2.上海大学美术学院 上海 200444)

【内容摘要】唐代官员常服在继承前制的基础上,进一步巩固等级规范,品级的差别主要体现在紫、绯、绿、青的品色制度和章服制度上。唐代官员常服是汉族传统服装与来自西域胡服的完美结合,是南北朝以来民族大融合、文明大交汇的直接反映,是其继承前制并结合自身要求内部调整的产物。常服在唐代的发展历程正是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美学观念的具体体现,即自然美服从于伦理美。

【关键词】唐代 官员 常服 文化美学

中图分类号:K242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007-9106(2011)04-0137-03

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,呈现了繁华富丽、别具特色的服饰文化,官员服饰可谓是其中的突出代表。《旧唐书·舆服志》:“衣裳有常服、公服、朝服、祭服四等之制。”其中,官员常服是传统风格、西域风格和时尚风格的最佳结合,是唐廷继承传统、内部调整之后制度化的产物,从而颇具时代特色,可谓服饰美学的具体体现。

—

常服,亦称“燕服”、“讌服”、“宴服”,本为古之裘服,百官可着此礼见、拜会,但不得用于祭祀及重大朝会。其自南北朝以来融入胡族因素,穿著便捷、舒适,遂逐步取代传统礼服的地位。《旧唐书·舆服志》:“讌服,盖古之裘服也,今亦谓之常服。江南则以巾褐裙襦,北朝则杂以戎夷之制。爰至北齐,有长帽短靴,合袴袄子,朱紫玄黄,各任所好。虽谒见君上,出入省寺,若非元正大会,一切通用。”

自隋代开始,常服被纳入礼制,上至天子下至文武百官均可著之。在发展过程中,乌纱帽逐渐被幞头所取代,而袍服亦被略加改制。“其乌纱帽渐废,贵贱通服折上巾,其制周武帝建德年所造也。晋公宇文护始命袍加下襞。”^{〔1〕}卷四五)唐代百官常服承袭前制,为圆领袍服,因前后襟下缘用一幅整布接成横襕,故称圆领襕袍,同时,受胡族风尚影响,初、盛唐时期流行窄紧短袖式样,中晚唐以来胡风渐弱,流行传统宽衣大袖。与常服配套的首服是幞头,足衣为乌皮六合靴,饰物有腰带、鱼(龟)袋等。

唐代为进一步巩固常服的礼仪规范,以示尊卑等级,在隋炀帝大业六年(610)规定“五品以上,通著紫袍,六品以下,兼用绯绿”^{〔1〕}卷四五)基础之上,制定了详细的律令格式,品级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二方面:一是品色制度,二是章服制

度。品色制度是以官员散官品级的不同而配以不同颜色、质料、纹样官服的制度,与之配套使用的还有腰带制度。唐武德四年(621)制定了初步的常服规范。《旧唐书·舆服志》:“三品以上,大科絁绫及罗,其色紫,饰用玉。五品以上,小科絁绫及罗,其色朱,饰用金。六品以上,服丝布,杂小绫,交梭,双紉,其色黄。六品、七品饰银。八品、九品鎗石。”唐太宗时期曾二次下诏加以修定。唐高宗时期,由于服饰紊乱,百官士庶每每不依令式,因而又曾二次重新申明,尤其是上元元年(674)之令,规定更为详备。《册府元龟》卷六〇《帝王部·立制度一》:“上元元年八月戊戌,诏:一品以下文官,并带手巾、算袋、刀子、磨石。其武官,欲带手巾、算袋者亦听。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,金玉带。四品服深绯,金带。五品服浅绯,金带。六品服深绿,七品服浅绿,并银带。八品服深青,九品服浅青,并鎗石带。”上元元年令为有唐一代服色制度的整个格局奠定基础,后世皇帝只是适时加以调整。时至晚唐,由于服色混乱,唐文宗不得不在上元元年令式基础之上详细定制,以适应形势的需要,同时,将常服纹样制度进一步规范。“太和六年六月,敕三品以上,许服鹞衔瑞草,雁衔绶带,及对孔雀绫袍袄。四品五品,许服地黄交枝绫。六品以下常参官,许服小团窠绫,及无纹绫,隔织独织等充。除此色外,应有奇文异制袍袄绫等,并禁断。”^{〔2〕}卷三二)

章服制度是常服发展至一定阶段的产物,是官员随身佩戴鱼(龟)袋的制度。《旧唐书·舆服志》:“自后(开元九年)恩制赐赏绯紫,例兼鱼袋,谓之章服。”随身佩鱼的目的,一是用它作为朝君应见的凭证,二是用来明贵贱、辨尊卑、严内外。常服佩鱼自隋代已初具形制,在唐代却经历了较大的变化,高祖武德元年(618)九月,改以往的银菟符为银鱼符。

* 本文为教育部2009年度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“唐、明两代官员服饰文化比较研究”阶段成果,项目编号:09YJC760005。

* 作者简介:李怡(1976-),女,北京科技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史学博士,主要从事艺术史、艺术理论、中国古典文献研究;马琳(1972-),女,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,主要从事艺术管理、艺术批评研究。

虽将鱼袋配发给四品、五品职事官,但退休后要交回,三年后,高宗皇帝人性化地调整了政策。“(永徽)五年八月十四日敕:恩荣所加,本缘品命,带鱼之法,事彰要重。岂可生平在官,用为褒饰,才至亡没,便即追收,寻其始终,情不可忍。自今以后,五品以上有薨亡者,其随身鱼袋,不须追收。”^{[2](卷三一)}此后,咸亨三年(672)五月三日,令京官四品、五品职事官佩银鱼。

武后时期将佩鱼范围扩大至地方诸州长官。《旧唐书·则天皇后本纪》:“(垂拱二年正月)初令都督、刺史并准京官带鱼。”武则天建立周朝以后,以玄武与“武”姓相合,于天授元年(690)九月,改内外所佩鱼并作龟,又初次规定按品级不同分别用金、银、铜铸龟袋。《旧唐书·舆服志》:“久视元年十月,职事三品以上龟袋,宜用金饰,四品用银饰,五品用铜饰,上守下行,皆从官给。”唐中宗时期又恢复佩鱼之制,但同时与滥授官职同步,开始让散官佩鱼,然并未正式将鱼袋与常服服色相连。《唐会要》卷三一“鱼袋”条:“神龙元年六月十七日敕文:嗣王郡王有阶级者,许佩金鱼袋。”此后,“景龙中,令特进佩鱼,散官佩鱼自此始也。然员外、试、检校官,犹不佩鱼。”^{[3](卷二四)}而且,“虽正员官得佩,亦去任及致仕即解去鱼袋。”^{[4](卷四五)}睿宗朝将鱼袋之制与常服服色相连。《唐会要》卷三一“鱼袋”条:“景云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敕文:鱼袋,著紫者金装,著绯者银装。”玄宗朝首先将佩鱼范围扩大,后许终身佩鱼。章服制度确立之后,一切检校、试、判、内供奉官均可佩鱼袋,官员退休后也不须交回,鱼袋成为常服中绯、紫服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,凡是赏赐绯、紫服时也要连带鱼袋,遂成为身份等级的象征。

二

从文化美学角度审视唐代官员常服,可以清楚地发现它是汉族传统服装与来自西域胡服的完美结合,是南北朝以来民族大融合、文明大交汇的直接反映。唐朝官员常服是继承前制,并在北方紧身、适体的异族服装基础上演变而来,而唐代的胡服实际上包括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服饰和印度、波斯等外国服饰,具有衣长及膝、衣袖瘦窄的特点,领式有圆领、翻折领、对襟开领等,腰间系革带,下著竖条小口裤,尖靴。《新唐书·五行志一》:“天宝初,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。”元稹《法曲》诗云:“自从胡骑起烟尘,毛毳腥膻满咸洛。女为胡妇学胡妆,伎进胡音务胡乐。火凤声沈多咽绝,春莺啼罢长萧索。胡音胡骑与胡妆,五十年来竞纷泊。”^{[4](卷四一九)}

胡服的广泛流行与大唐皇室的胡族血统有关。“李唐先世本为汉族,或为赵郡李氏徙居柏仁之‘破落户’,或为邻邑广阿庶姓李氏之‘假冒牌’,既非华盛之宗,故渐染胡俗,名不雅驯。……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,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,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,旧染既除,新机重启,扩大恢张,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。故欲通解李唐一代三百年之全史,其氏族问题实为最要之关键。”^{[5](P344)}而胡服深藏着唐室“关中陇上一带的豪强劲旅那带有边塞烽火和大漠风沙气息的刚强、剽悍之中不无粗豪、朴野味道的勇武雄壮的精神气质。”^{[6](P9)}同时,与传统中原服饰相比,胡服没有森严的等级性,装饰自由、舒适且灵适方便。

更为重要的是,自南北朝至隋代一直在进行着的民族

大融合及多种文明大交汇的现实,是以常服为代表的胡服流行的根本原因。《梦溪笔谈》卷一:“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,乃全非古制,窄袖、绯绿短衣、长靴鞬,有鞬鞞带,然亦有取窄袖利于驰射,短衣长靴皆便于涉草。”《朱子语类》卷九一:“今世之服,大抵皆胡服,如上领衫、靴、鞋之类,先王冠服扫地尽矣。中国衣冠之乱,自晋五胡后来遂相承袭,唐接隋,隋接周,周接元魏,大抵皆胡服。”唐王朝是在中国经历了十六国至南北朝近三个世纪的大分裂、大动荡及民族大迁徙、大融合之后,在隋代短暂统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,胡汉民族之间的交融渗透早已突破了单一、因袭的传统格局,诸胡汉化与汉族胡化已成为现实,而丝绸之路的重新畅通,将当时世界诸多文明形式引入唐朝,在积极吸收这些文明成果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大唐文明盛极一时,正是胡族习俗、异国文明与隋唐本土传统相互交流影响,使人们的价值取向向进一步突破传统儒家的桎梏,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,造就了唐人兼容并包、平等开放的独特的社会心理,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。

同时,唐代官员常服是大唐帝国继承传统,对南北朝、隋以来官服体系发展趋势的认可和肯定,更是其结合自身要求内部调整的产物。唐初,制度尚不齐备,车舆服饰仍沿袭隋朝旧制,直至高祖武德四年颁布调整衣冠服饰之令文。“唐初受命,车、服皆因隋旧。武德四年,始著车舆、衣服之令,上得兼下,下不得拟上。”^{[3](卷二四)}这是自东汉明帝恢复“礼制”以来及隋炀帝“宪章古制,创造衣冠,自天子逮于胥皂,服章皆有等差”^{[7](卷一〇)}之后,所拟定的最系统的舆服制度,使祭服、朝服、公服等体系较前代更为完备,然而自南北朝以来大礼服之外的日常礼服以其穿着舒适便利,日益受到重视,并在大多数场合取代了传统礼服的地位,唐廷在隋朝定制的基础上,仍面临着常服改制及等级化的问题。

在形制上,唐室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,对常服加以辨别并予以整理,例如幞头,起初只是一块民间的包头布,隋唐时期经过整改,尤其是唐朝对巾子、幞头两脚等适时定制,遂为官员日常之首服,而且五代、两宋以来成为有固定帽身骨架和展角的完美造型,一直流行到17世纪的明末清初,才被满式冠帽所取代。又如襴袍衫,至唐太宗时期正式确立了以古制深衣为基础且施以横襴为官员身服,成为既符合传统又有大唐特色的新款礼服。此外,为规范服制,唐高祖初步确立紫、朱、黄的服色等级,太宗将其调整为紫、绯、绿、青,并公开强调服色尊卑有别,此后历朝皇帝竭力加以维护,最终确立并规范了常服制度。

三

唐代官员常服本身体现了真正的自然美,即注意服饰质料、色彩、纹样等形式因素与自然的统一,并追求服饰的整体、和谐之美和舒适、方便之用。唐代经济的繁荣,纺织印染工艺的发达为服饰发展奠定了厚实的物质基础,作为国家核心权力阶层的官员集团,服饰更是唐服中的精品,其美妙外表的形成与大自然有着密切联系,不但服饰的质料取之于自然,服饰形式、色彩、纹样等等也都是唐人不断观察利用自然的结果,例如从常服的花鸟纹样,到以鱼或龟为原形的佩饰鱼符、龟符等等,无不反映出唐人开发自然、利用

自然来美化自身的聪明才智和以自然为美的服饰风尚。同时,官员常服也最能体现服饰的整体美化效果,该服在传统深衣基础之上加以改进,并适时地融入异域风格,圆领、窄袖、袍下施襴,即为圆领襴袍衫,其通体相连,色彩上亦是上下一致的单一色调,同时,出于实用的考虑,系束腰带,首服、足服为纯黑之幘头和靴子,这些附件既可对常服起到加固作用,又与其本色互相映衬,产生对比统一的装饰效果。

常服本身的这些特点与传统官员服饰的伦理美观念相应。伦理美,即官员服饰强调与身份等级相一致,以封建伦理道德原则作为衡量服饰美丑的标准。早在先秦时期,统治者对于服饰的伦理性能已有所认识,服饰成为社会治乱的一种标志。《白虎通义》卷下“衣裳”条:“圣人所以制衣服,何以为絺紵蔽形,表德劝善,别尊卑也。”由于中国自汉代以来逐渐形成了完备的官僚体系,故其服饰之政治性、伦理性极强,以达到助人君、顺阴阳、明教化、辨贵贱的目的。

唐代官员服饰分为两大类,即大礼服和普通礼服,均等级森严,不可逾越。前者包括祭服、朝服和公服,是封建社会权力等级的象征,具有较大的继承性和保守性;后者则时代特征鲜明,包括袴褶服和常服,以色彩、佩饰等分别尊卑。然而,由于起自中原的朝服、公服礼节繁琐,为方便使用,唐廷虽将服制具于令文,但逐渐简化,并在实际操作中被胡式服装袴褶服、常服所取代,而袴褶服由于既非古制,又不如常服便利,也逐渐消亡,只有常服长期使用。同时,为维护官员服饰等级的制度化,唐廷不仅下达服色令,而且作了大量细致的工作,多次下诏强调常服尊卑有别,以维护该体系正常运转。

无论是历史的沉积还是大唐王朝的不懈努力,凡此种种,都从不同角度强化着唐人服饰审美观念中的社会伦理色彩,美的服饰必须与上下等级贵贱相适应,否则就是丑陋的,脱离君与臣的等级、脱离社会的伦常规范,单纯追求视觉、感觉上的舒适自如,则会被包括唐代在内的中国古代服饰美学思想所不容,会遭到官方的禁止和社会舆论的指责。唐代官员常服以伦理道德为美的风尚,不仅是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所采取的必要措施,也是自古以来服饰被视为“顺天道”之术,儒家“天命观”思想的体现,同样,儒家对“天道”的认识以及与此相关的“天人感应”等理论对唐代官员常服的影响也是极为深刻的:一方面,它竭力维护古制中与此相关的服制,另一方面,也有不少新的创造,从而对官服的色彩、纹样、饰物等装饰理念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。

例如,将服色分为正色与间色,重正轻间,以此体现尊卑。古时以纯色为正色,两色相杂为间色,正色通常指青、

赤、白、黑、黄五色,用于衣服表层或上衣,间色,相对正色而言,是不纯正的五种颜色,分别指绿、红、碧、紫、骝黄五色,因由青、赤、白、黑、黄等五种正色调和相间而成得名,多用于衣服的衬里或下裳,后泛指五种正色之外的任何颜色。唐代官员大礼服严格遵循古制,祭服青衣纁裳,青为正色,纁乃浅绛,为间色,朝服、公服均为绛色,绛乃大赤也,为正色。常服则显示了大唐时代特色,相对自由,将赤黑之间的紫色和赤白之间的绯色,由原来卑贱的象征转化为富贵的标志。韩愈《送区弘南归》诗云:“腾蹋众骏事鞍鞿,佩服上色紫与绯。”^[4]卷三三九,绿色也一改以往的卑下地位,成为常服的一种色彩。韦庄《送崔郎中往使西川行在》诗云:“新马杏花色,绿袍春草香。”^[4]卷六九七。

通观唐代官员服饰,大礼服遵从古制,以伦理为重,普通礼服虽也规范等级,但在实际使用中更多地是以自然为尚,并融入胡服风格。这种着装理念的形成,除受儒家观念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影响之外,还有更为重要的时代原因,即自南北朝以来一直在进行着的民族大融合及多种文明的大交汇。在隋唐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中,经济繁荣期有之,社会稳定期有之,尽管都产生了与之相适合的服饰发展,却没有哪一个朝代的服饰发展水平能与唐代胡、汉服饰共同发展相匹敌。服饰到底还是一种文化现象,脱离不了一定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,又绝不可能就是一定时期社会经济活动的翻板,说到底还是要受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,唐代多种民族交融、多样文明碰撞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结构,以及这种多元文化结构对社会审美价值取向和审美行为的渗透、影响和支配,不但给当时的人们构思、设计各种服饰提供着文化依据,同时也对唐代服饰形成独特风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如果说赵武灵王的“胡服骑射”主要是为了便于作战,实用目的明显的话,那么,唐代官员盛行的常服则属于多民族共同生活、相互交流的产物,服饰的文化意义更加突出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〔后晋〕刘昫,等.旧唐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- [2] 〔宋〕王溥.唐会要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8.
- [3] 〔宋〕欧阳修等.新唐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- [4] 〔清〕彭定求等.全唐诗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9.
- [5] 陈寅恪.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,金明馆丛稿二编[M].北京:三联书店,2001.
- [6] 霍然.唐代美学思潮[M].长春:长春出版社,1997.
- [7] 〔唐〕魏征,等.隋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3.